

# 幼儿在不同规范标准下的意图判断： “副作用”效应

刘希平<sup>1,2,3</sup> 云蕙霏<sup>2</sup> 柴凯轩<sup>2</sup> 李楠<sup>4</sup> 唐卫海<sup>1,2,3</sup>

(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天津 300387)

(2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天津 300387) (3 学生心理发展与学习天津市高校社会科学实验室, 天津 300387)

(4 广东培正学院, 广州 510830)

**摘要** 在幼儿对主人公的行为意图做出判断后加入奖惩任务, 用意图“有无”判断和星星分配的数量作为考察“副作用”效应的指标, 探讨幼儿在不同规范标准下能否利用理性策略对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进行推断。结果发现: (1) 幼儿对带来积极和消极“副作用”的行为意图“有无”判断没有差异; (2) 相比于消极“副作用”, 幼儿倾向于给带来积极“副作用”的行为者分配更多的星星作为奖励; (3) “副作用”效价对4、5、6岁幼儿分配行为的影响是一致的; (4) 在道德规范标准和约定规范标准下, “副作用”效价对4、5、6岁幼儿分配行为的影响是一致的。结果表明: (1) 使用星星分配数量作为指标考察幼儿的行为意图判断更敏感。(2) 幼儿会把违背规范的行为推断为有意的, 遵守规范的行为推断为无意的。且这种表现在4~6岁之间具有稳定性。不同规范标准下, 幼儿的这一表现没有差异。(3) 研究结果支持了意图判断“副作用”效应的理性推理观点。

**关键词** 副作用效应, 意图判断, 规范标准, 理性推理。

**分类号** B844

## 1 引言

行为“副作用”(即行为导致的附加结果)的效价会影响个体对行为意图的判断。即使行为者先前已知晓并表示不关注“副作用”的发生, 个体也倾向于认为伴有消极“副作用”行为的执行者是有意导致消极“副作用”发生的; 而并不倾向于认为伴有积极“副作用”行为的执行者是有意带来积极“副作用”的。也就是说, 个体对伴有不同“副作用”效价的行为意图判断有着不对称的判断倾向, 这种现象被称作意图判断的“副作用”效应(the side-effect effect, SEE)(Knobe, 2003)。

SEE说明个体的道德判断会影响意图判断。因此, 国内外发展性研究考察了SEE产生的基础。有研究者认为, SEE体现了个体早期的道德感知或“道德能力”; 也有研究者认为, SEE反映出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个体差异。国内对于SEE的研究比较有限, 有两项研究分别考察了成年人(张靖昊, 2017)以及初中生(陈友庆, 陶君, 2016)的SEE, 并且都发现积极和消极的道德效价影响被试的意图判断, 并表现出不对称的判断模

式。而国外研究者则更早关注了幼儿意图判断的SEE。Leslie, Knobe和Cohen(2006)发现, 3岁幼儿能够理解“事先知晓”的概念, 但不能够理解“不关心”的概念, 因此, 3岁幼儿没有表现出SEE, 而4岁幼儿出现了SEE。Pellizzoni, Siegal和Surian(2009)的研究也发现了4~5岁幼儿表现出了SEE。但该研究也发现, 即使在4~5岁幼儿中, 仍然有不少幼儿没有表现出SEE。那么, 什么因素影响了幼儿SEE的发展表现? Michelin, Pellizzoni, Tallandini和Siegal(2010)控制了幼儿意图判断发展过程中的个体差异, 考察了故事呈现形式与双语经验对3~5岁幼儿意图判断的影响。结果发现, 即使是3岁幼儿, 也表现出了SEE现象, 同时具有双语经验的被试的SEE表现倾向性更明显。上述研究说明, 幼儿早期已经具有道德意识, 并且会受到社会化过程导致的个体差异的影响。

上述研究考察了道德规范标准下幼儿的SEE, 但在不同的规范标准下, 幼儿的SEE是否会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规律? Uttich和Lombrozo(2010)将“禁止性规范”分为“道德规范”和“约定规范”。

收稿日期: 2019-09-12

通讯作者: 唐卫海, E-mail: twhpsy@126.com。

禁止性规范 (prescriptive norm/injunction norm) 是对人们在某种情境下“应该做什么”(Lapinski & Rimal, 2005), 或者“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所做出的规定 (Lindström, Jangard, Selbing, & Olsson, 2018)。个体在该规范下的行为受到避免社会制裁的动机驱使, 并会感受到违背规范带来的压力 (Kallgren, Reno, & Cialdini, 2000)。道德规范 (moral norm) 是指约束人们尊重和维护他人固有利益、公平和权利的规范, 例如, “不能偷窃”。约定规范 (conventional norm) 是指确保群体成员按照相同的方式言行所做出的规定, 例如, “把黄色的玩具放进黄色的盒子里” (Heiphetz & Young, 2017; Mammen, Köymen, & Tomasello, 2018; Yucel, Hepach, & Vaish, 2020)。

幼儿从 3 岁开始就能够理解道德规范与约定规范的本质。幼儿能够认识到这两种规范最大的区别在于适用性不同: 不论是何种社会环境背景下, 幼儿总是认为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是错误的, 不被允许的, 而且后果更加严重, 理应得到更多惩罚; 而违反约定规范仅仅是违背了某个社会组织的规则 (Lahat, Helwig, & Zelazo, 2013; Mammen et al., 2018)。此外, 当幼儿意识到违背规范的行为引起了受害者情绪化的反应, 幼儿就将该行为知觉为违背了道德规范; 而当违背规范的行为并没有导致情绪化的反应, 幼儿就认为这是违背了约定规范 (Nichols, 2002)。那么, 在心理理论领域, 幼儿对两种规范标准的认知是否会影响对他人的意图判断? Rakoczy 等人 (2015) 首次考察了幼儿在道德和约定规范标准中的 SEE, 并发现, 4~5 岁幼儿在两种规范标准下的意图判断是一致的, 表现出了稳定的 SEE。

但 Rakoczy 等人 (2015) 的研究范式仍存在不足。即在道德规范标准和约定规范标准下的故事情境设置并不完全对等。具体来说, 在道德规范标准的故事情境中, 遵守/违背规范的行为带来的“副作用”使行为对象受到了情绪上的影响, 由此产生了与道德相关的“副作用”。这很容易让被试理解行为与结果的关系。然而, 在约定规范标准的故事情境中, 对“副作用”的操作仅仅描述了动物的位置状态。因此, 被试对行为与结果关系的解读是不清楚的。

那么, 在意图判断中, 为什么会出现 SEE 现象? 研究者提出了两种观点来解释 SEE 产生的机制。第一, 理性推理 (rationality accounts)。人们

之所以对违背与遵守规范的行为做出不同的意图判断, 是因为违背规范的行为给推断行为者的心理状态和特质提供了认知基础, 但遵守规范的行为并不能提供类似的认知基础。具体来说, 人们在对行为者的心理状态进行推断时, 使用了理性策略。这种理性策略是考虑行为者的行为与规范的关系, 即行为者的行为是否有意违背或者有意遵守了规范。而且这种推断受到行为者“知识”(行为者事先知道自己遵守/违背规范的行为会引起积极/消极“副作用”)的指导,“知识”的作用在积极和消极情境中的不对称性 (Holton, 2010), 导致了人们对行为者心理状态推断的不对称性。即如果个体认为行为者事先知道违背规范的行为会引起消极“副作用”, 但选择忽视这种可能性, 并仍然执行了该行为, 则个体表现出 SEE 的倾向就更加明显。第二, 道德效价推理 (morality account)。道德错误的行为会自发引起人们对于该行为的负性反应, 进而导致对行为者的责任归因。为了使责任归因合理化, 人们就强调行为者是有意做出该行为的。而道德正确的行为并不会引发需要被合理化的负性反应, 因此, 道德正确的行为就不太可能被判断为有意做出的 (Alicke, 2000)。

这两种观点的区别是, 理性推理强调, 个体在进行行为意图判断时采取了理性策略, 或者说会将故事情境中的相关信息作为其推断行为者心理状态的证据。而道德效价推理认为, 个体会根据行为者引起的道德结果直接做出意图推断。本研究推测: (1) 如果 SEE 不仅在道德规范标准下存在, 而且在与道德无关的纯粹人为制定的约定规范标准上也能够表现出来, 那么, 理性推理观点就是正确的; (2) 如果以幼儿给主人公分配星星的数量作为考察指标, 幼儿表现出了不对称的奖惩行为, 也能为验证理性推理观点提供证据。

总体来看, 本研究尝试考察两个问题。第一, 使道德规范标准与约定规范标准下的故事情境相匹配, 并使用不同的指标来探讨幼儿 SEE 产生的原因与发展趋势。第二, 考察是“理性推理”还是“道德效价推理”更能解释幼儿的 SEE。除了通过幼儿在道德规范和约定规范标准上的意图判断表现来揭示该问题, 本研究在意图判断任务后额外设计了奖惩任务, 尝试探讨幼儿是否会采用理性策略推测主人公的心理状态。

具体来说, 根据理性推理的认知加工过程, 个体对行为者的意图判断分为两个阶段。阶段

一, 个体利用对表征积极/消极情境, 或者“诊断”行为者心理状态有关键作用的信息, 并将其整合为理性策略推断行为者的行为表现; 阶段二, 个体在上述推断的基础上判断行为者是否有意执行该行为 (Feltz, 2007; Leslie et al., 2006)。以此为基础, 奖惩任务通过提示幼儿主人公引起“副作用”的遵守/违背规范的行为, 并要求幼儿对主人公的行为表现进行评估, 进而给予主人公奖励/惩罚 (分配星星), 来直接分析幼儿如何表征积极/消极情境。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相比于意图“有无”判断任务, 利用分配星星任务, 考察幼儿对伴随不同效价“副作用”的主人公行为的偏爱程度, 可以更敏感地考察幼儿SEE的推理过程。

假设2: 如果在道德规范标准和约定规范标准中, 幼儿都表现出对行为者心理状态推断的不对称性, 则说明幼儿在两种规范中都能理性地使用分析策略进行推断, 理性推理观点成立; 如果幼儿只在道德规范标准下表现出对行为者心理推断的不对称性, 则说明幼儿只能够根据道德结果进行非理性的推断, 道德效价推理观点成立。

## 2 研究方法

### 2.1 实验设计

采用2 (“副作用”效价: 积极、消极) × 3 (年龄: 4岁、5岁、6岁) × 2 (规范标准: 道德规范、约定规范) 的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意图“有无”判断得分和星星分配数量。

### 2.2 被试

被试来自天津市四所幼儿园。主试从小、中、大班中随机选取了532名幼儿 (男孩265名, 女孩267名), 年龄在38~81个月之间, 并按年龄大小进行了分组: 4岁 (38~54个月)、5岁 (55~66个月) 和6岁 (67~81个月)。完成正式实验后, 保留了3个控制问题都通过的被试, 最终获得491名有效被试。4岁组161人, 5岁组170人, 6岁组160人。每名被试随机接受四种故事情境中的一种。

### 2.3 实验材料和工具

#### 2.3.1 实验材料

虚拟故事。为了避免被试对故事中主人公的性别偏好 (Susskind & Hodges, 2007; Xiao, Cook, Martin, Nielson, & Field, 2019), 实验编制了两个版本的故事材料, 每个版本包括四种故事情境。两

个版本唯一的区别是故事主人公的性别不同, 一个版本的主人公是男孩, 另一个版本的主人公是女孩。一部分男孩观看男主人公版本的故事, 而另一部分男孩观看女主人公版本的故事。女孩也是如此。在道德规范标准下, 主人公的行为会导致积极的结果 (如, 引起弟弟的愉悦感), 或者消极的结果 (如, 引起弟弟的恐惧感); 在约定规范标准下, 主人公的行为也会引起积极的结果 (如, 人们想和小老鼠做好朋友, 会跟它友好相处), 或者消极的结果 (如, 小老鼠会偷吃粮食, 人们把小老鼠抓起来)。四种故事情境的共同点是, 主人公知晓行为会引起“副作用”, 但表示不关心“副作用”的产生。本研究采用的故事情境的优势是: (1) 设置了主人公为男孩和女孩两个版本的故事, 严格控制无关变量, 即幼儿对主人公的性别偏好; (2) 更明确地阐述约定规范标准故事中的“副作用”, 使幼儿能清楚理解故事情境。

控制问题。故事叙述过程中穿插了3个控制问题, 以确保幼儿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 同时保证幼儿的注意力维持在实验上。控制问题分别调查了幼儿是否知晓行为结果、是否知晓行为“副作用”以及是否知晓主人公不关心“副作用”的发生。

测试问题。意图“有无”判断任务的测试问题是: “小明 (小红) 是故意……的, 还是无意……的?” 奖惩任务的测试问题要求幼儿评价主人公遵守/违背规范的行为表现, 以及分配星星 (如, “你认为小明这样的表现好吗? 你认为老师会分给小明几颗小星星?”)。

问题得分。(1) 对控制问题的记录。对于每一个控制问题, 幼儿可能一次性通过问题, 也可能第一次没有通过问题, 这需要主试回到有关该问题的情境, 再次给幼儿讲述相关内容。最多有两次提示, 经过三次询问后幼儿仍无法通过, 就让该幼儿停止实验。(2) 对意图“有无”判断得分的记录。如果幼儿的回答是“故意的”, 就表明幼儿将主人公的行为判断为“有意”, 计1分; 如果幼儿的回答是“无意的”, 就表明幼儿将主人公的行为判断为“无意”, 计0分。(3) 对星星分配数量的记录。幼儿以第三方身份判断教师分配给故事主人公的星星数量, 数量为1~5颗, 分配得越多表明幼儿认为主人公的行为表现越好。

#### 2.3.2 实验仪器

笔记本电脑, 记录表, 笔。



## 2.4 实验步骤

实验是个别进行的。所有数据由两位主试搜集完成。一名主试搜集了 154 个数据,分布在 3 个年龄段的不同任务中。剩余数据由另一名主试搜集。第一步,幼儿完成练习任务,完成后进行 30 s 的无关活动,之后进行正式实验。第二步,观看故事。主试邀请幼儿观看 PPT,并向幼儿演示、讲述故事。第三步,控制问题问答。主试对幼儿进行控制提问,记录幼儿的回答。第四步,完成意图判断任务。请幼儿回答意图“有无”判断问题,记录幼儿的回答。第五步,完成奖惩任务。主试首先提示幼儿故事主人公引起“副作用”的遵守/违背规范的行为,之后请幼儿回答测试问题,记录幼儿的回答。

## 3 结果

使用 SPSS22.0 进行数据分析。

正式实验之前,通过让幼儿对小老鼠(小兔子)的喜好程度进行评分,考察了幼儿对两种动物的态度。3(年龄:4岁、5岁、6岁)×2(性别:男孩、女孩)×2(动物类型:老鼠、兔子)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年龄、性别与动物类型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0.05$ 。这表明,故事情境中的小动物类型不会对 4~6 岁幼儿的意图判断产生影响。

### 3.1 意图“有无”判断中“副作用”效应的发展

对幼儿意图“有无”判断中回答“是”的人次进行统计,得到不同条件下 4~6 岁幼儿的判断结果。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幼儿在意图判断任务中回答“是”的人次

年龄	积极效价		消极效价	
	道德规范	约定规范	道德规范	约定规范
4岁	14 (41)	10 (40)	17 (40)	14 (40)
5岁	16 (40)	25 (38)	20 (41)	29 (51)
6岁	20 (40)	20 (40)	23 (40)	15 (40)

注:括号中为不同实验条件下的总人数。

采用  $\chi^2$  检验对幼儿在不同规范标准和“副作用”效价条件下的意图“有无”判断人数进行分析。

第一,考察“副作用”效价在幼儿意图“有无”判断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副作用”效价在意图“有无”判断上差异不显著, $\chi^2=0.54$ , $p=0.465$ 。结果表明:“副作用”效价与幼儿的意图“有无”判断无关,幼儿总体并没有表现出 SEE。

第二,不同年龄段幼儿的 SEE 表现差异是否导致“副作用”效价主效应不显著?分别考察对于 4、5、6 岁三个年龄段幼儿,“副作用”效价在意图“有无”判断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对于 4、5、6 岁幼儿来说,“副作用”效价在意图“有无”判断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chi^2_{4岁}=1.49$ , $p_{4岁}=0.222$ ;  $\chi^2_{5岁}=0.01$ , $p_{5岁}=0.928$ ;  $\chi^2_{6岁}=0.06$ , $p_{6岁}=0.811$ 。结果表明,在 4~6 岁不同年龄段幼儿中,SEE 都没有发生。

第三,SEE 在不同年龄段幼儿中没有表现出来,是否是不同规范标准下的 SEE 表现趋势差异导致的?分别考察在道德规范标准和约定规范标准下,对于 4、5、6 岁三个年龄段幼儿,“副作用”效价在意图“有无”判断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对于 4、5、6 岁幼儿来说,不同规范标准下的意图“有无”判断差异均不显著, $\chi^2_{道德规范 \times 4岁}=0.60$ , $p_{道德规范 \times 4岁}=0.439$ ;  $\chi^2_{道德规范 \times 5岁}=0.63$ , $p_{道德规范 \times 5岁}=0.427$ ;  $\chi^2_{道德规范 \times 6岁}=0.64$ , $p_{道德规范 \times 6岁}=0.423$ ;  $\chi^2_{约定规范 \times 4岁}=0.95$ , $p_{约定规范 \times 4岁}=0.329$ ;  $\chi^2_{约定规范 \times 5岁}=0.73$ , $p_{约定规范 \times 5岁}=0.394$ ;  $\chi^2_{约定规范 \times 6岁}=1.27$ , $p_{约定规范 \times 6岁}=0.260$ 。结果表明,在意图“有无”判断中,无论是在道德规范还是在约定规范标准下,4~6 岁幼儿都没有表现出 SEE。

### 3.2 星星分配任务中“副作用”效应的发展

对幼儿判断教师分配给故事主人公的星星数量进行统计,得到不同条件下 4~6 岁幼儿的判断结果,描述性统计值见表 2。

表 2 幼儿星星分配任务得分

年龄	积极效价		消极效价	
	道德规范	约定规范	道德规范	约定规范
4岁	3.05 (1.79)	3.20 (1.91)	2.60 (1.66)	1.78 (1.33)
5岁	2.43 (1.65)	2.92 (1.85)	2.05 (1.48)	1.96 (1.50)
6岁	2.88 (1.65)	3.35 (1.67)	1.93 (1.42)	2.45 (1.45)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2 (“副作用”效价:积极、消极)×3 (年龄:4岁、5岁、6岁)×2 (规范标准:道德规范、约定规范)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副作用”效价的主效应显著, $F(1, 479)=33.15$ , $p<0.001$ , $\eta_p^2=0.065$ 。结果表明:幼儿在积极“副作用”条件下分配的星星数量显著多于消极“副作用”条件。幼儿认为,老师会认为带来积极“副作用”的主人公表现更好,并对伴有积

极“副作用”的行为进行奖励。第二,为了分析幼儿的SEE是否具有发展趋势,考察了“副作用”效价和年龄的交互作用,并发现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479)=0.36, p=0.696$ 。这说明,4岁、5岁、6岁幼儿都会对消极“副作用”给予较少的奖励,而对积极“副作用”给予更多的奖励。第三,为了分析幼儿的SEE在不同规范标准下是否有不同的发展趋势,考察了“副作用”效价、年龄和规范标准的交互作用,发现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479)=1.03, p=0.359$ 。这表明,4~6岁幼儿表现出了对故事主人公心理状态推断的不对称性,但在4~6岁期间没有发展变化的趋势,同时,在不同规范条件下,这种表现完全一致。

## 4 讨论

### 4.1 4~6岁幼儿“副作用”效应的发展

本研究首先对Rakoczy等人(2015)的范式进行了调整。在约定规范标准的故事情境中,使行为者遵守/违背约定规范标准而带来的“副作用”与规范标准本身有更明显的区分,并且能够清晰地体现出故事主人公遵守/违背约定规范标准是引起“副作用”的原因。这样就能够使幼儿充分理解主人公的行为会引起怎样的“副作用”,而不会存在规范标准与行为结果模糊不清的情况。以此保证幼儿在道德规范标准和约定规范标准下的意图判断表现是可以比较的。

基于更加合理的范式,本研究考察了幼儿的意图判断是否存在SEE现象。结果发现,利用意图“有无”判断,并没有发现幼儿的SEE;但利用幼儿对教师给故事主人公分配星星数量的判断,表明相比于消极“副作用”,4~6岁幼儿倾向于给带来积极“副作用”的行为者分配更多的星星进行奖励。这说明,与意图“有无”判断任务相比,星星分配任务可以更敏感地考察幼儿SEE的推理过程。研究还发现,4~6岁幼儿对故事主人公心理状态推断不对称现象的表现并没有随着年龄而变化。这说明,即使是4岁幼儿,只要条件合适,指标足够敏感,其意图判断的认知加工过程可能与较高年龄段的幼儿相仿。

### 4.2 意图判断中的理性推理观点

本研究还揭示了,不论是在道德规范标准还是在约定规范标准下,相比于消极“副作用”,幼儿都会给带来积极“副作用”的行为者分配更多的星星。这一结果符合理性推理的观点。幼儿

在评价主人公是否有意带来了“副作用”时,会考虑行为与规范标准的关系,而不仅仅是行为的结果。在理性推理的认知加工过程中,相比于遵守规范的行为,违背规范的行为在对行为者及其动机、特质的推断上更具有“诊断性”或借鉴性。也就是说,幼儿认为违背规范的行为一定是存在原因的。即在消极“副作用”的情境中,主人公事先知晓行为会带来“副作用”的认知基础足以让幼儿推断出主人公有意违背了规范;但在积极“副作用”的情境下,“事先知晓”的信息就不足以帮助幼儿推断行为的原因,即主人公是由于动机驱使,还是仅因为规则限制而遵守规范,幼儿是不理解的。

Nichols和Ulatowski(2007)指出,意图判断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事先知晓”。如果个体在理解了行为者事先知晓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副作用”,并基于此对行为者“不关心”的态度进行解释,那么,就会形成一种理性的分析。行为者“不关心副作用”本来是一种中性的态度(Leslie et al., 2006),表面上看,行为者并不是有意带来了某种特定的“副作用”。但是,在消极情境中,幼儿考虑到行为者事先知晓消极“副作用”会发生,为了避免消极结果,他本来不应该去执行行为,但行为者却选择忽视这种可能性。因此,幼儿会倾向于认为主人公有意违背了规范。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在幼儿完成“奖惩”任务后,询问幼儿“你为什么觉得小明的表现好/不好?”幼儿陈述的理由基本上与上述心理状态的推断一致。

本研究结果发现,在对幼儿进行认知引导之前,幼儿对意图“有无”直接进行判断,其SEE并没有发生;但通过提示幼儿主人公遵守/违背规范的行为,并要求幼儿对主人公的行为表现进行评估后,幼儿对伴随不同“副作用”的行为却做出了不同的奖励预期。这说明,认知推理在幼儿的意图判断中起到了作用。然而,在本研究中,幼儿为什么不是完全主动自发地去评价主人公的行为表现,而是需要经过一次提示呢?研究者猜测,有可能是因为幼儿的理性推理能力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不足以让幼儿独立完成这个认知加工过程。或许前人研究的数据可以间接为这个猜测提供一些证据。在Leslie等人(2006)的研究中,并不是所有幼儿都表现出了SEE现象,仍然有30%~40%的幼儿并没有将消极

“副作用”判断为主人公有意带来的。在 Rakoczy 等人 (2015) 的研究中, 也有 50% 的幼儿没有将消极条件下的行为判断为有意。这或许表明, 幼儿的理性推理能力还没有完全达到与成年人一样的水平。这可能使幼儿不能自主地表现出 SEE。而通过适当的提示来弥补幼儿推理水平上的不足, 起到了“触发”幼儿去推断行为者心理状态的作用。

本研究虽然初步证明 4~6 岁幼儿行为意图判断存在理性成分, 但考虑到研究者对影响道德判断的认知和情绪因素的争论 (Danovitch & Keil, 2008; Greene & Haidt, 2002; Haidt, 2001; Nichols & Mallon, 2006; Pizarro & Bloom, 2003), 未来可以采用更直接有效的方法探讨 SEE 是由理性推理导致的, 还是由“副作用”效价引发的责任归因或者道德情绪所带来的意图判断偏差导致的。前人研究将“副作用”效价和规范标准两个因素混淆起来, 即积极情境对应遵守规范, 同时, 消极情境对应违背规范。这样就不能探讨幼儿 SEE 形成的原因 (Uttich & Lombrozo, 2010)。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行为者是否违背规范标准与“副作用”效价是相互独立的因素, 这就会形成不同于传统 SEE 案例的其他类型案例。例如, 行为者违背了一项法律, 但带来了积极“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在大多数被试看来是好的结果, 这个行为会被判断为有意的; 如果行为者因为遵守法律带来了消极“副作用”, 这个行为就会被判断为无意的 (Knobe, 2006, 2007)。

## 5 结论

(1) 使用星星分配数量作为指标考察幼儿的意图判断更敏感。(2) 幼儿会把违背规范的行为推断为有意的, 遵守规范的行为推断为无意的, 且这种表现在 4~6 岁之间具有稳定性。不同规范标准下, 幼儿的这一表现没有差异。(3) 研究结果支持了 SEE 理性推理观点。

**致谢** 诚挚地感谢马丽老师在本研究数据采集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 参 考 文 献

- 陈友庆, 陶君. (2016). 重要他人情境对青少年意图判断诺布效应的影响. *心理与行为研究*, 14(4), 471-478, doi: [10.3969/j.issn.1672-0628.2016.04.007](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628.2016.04.007).
- 张靖昊. (2017). 行为态度与道德效价对意图判断的影响: 期望与规范预期的中介作用. 第二十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心理学与国民心

理健康, 重庆.

- Alicke, M. D. (2000). Culpable control and the psychology of blam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4), 556-574, doi: [10.1037/0033-2909.126.4.556](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6.4.556).
- Danovitch, J. H., & Keil, F. C. (2008). Young Humeans: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children's evaluation of moral reasoning abilities. *Developmental Science*, 11(1), 33-39, doi: [10.1111/j.1467-7687.2007.00657.x](https://doi.org/10.1111/j.1467-7687.2007.00657.x).
- Feltz, A. (2007). The Knobe effect: A brief overview. *The Journal of Mind and Behavior*, 28(3-4), 265-277.
- Greene, J., & Haidt, J. (2002). How (and where) does moral judgment work?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6(12), 517-523, doi: [10.1016/S1364-6613\(02\)02011-9](https://doi.org/10.1016/S1364-6613(02)02011-9).
- Haidt, J. (2001).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4), 814-834, doi: [10.1037/0033-295X.108.4.814](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08.4.814).
- Heiphetz, L., & Young, L. L. (2017). Can only one person be right? The development of objectivism and social preferences regarding widely shared and controversial moral beliefs. *Cognition*, 167, 78-90, doi: [10.1016/j.cognition.2016.05.014](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16.05.014).
- Holton, R. (2010). Norms and the Knobe effect. *Analysis*, 70(3), 417-424, doi: [10.1093/analys/anq037](https://doi.org/10.1093/analys/anq037).
- Kallgren, C. A., Reno, R. R., & Cialdini, R. B. (2000). A 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 When norms do and do not affect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6(8), 1002-1012, doi: [10.1177/01461672002610009](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02610009).
- Knobe, J. (2003). Intentional action and side effects in ordinary language. *Analysis*, 63(3), 190-194, doi: [10.1093/analys/63.3.190](https://doi.org/10.1093/analys/63.3.190).
- Knobe, J. (2006). The concept of intentional ac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uses of folk psychology. *Philosophical Studies*, 130(2), 203-231, doi: [10.1007/s11098-004-4510-0](https://doi.org/10.1007/s11098-004-4510-0).
- Knobe, J. (2007). Reason explanation in folk psychology.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31(1), 90-106, doi: [10.1111/j.1475-4975.2007.00146.x](https://doi.org/10.1111/j.1475-4975.2007.00146.x).
- Lahat, A., Helwig, C. C., & Zelazo, P. D. (2013).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of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judgments of moral and social conventional violations. *Child Development*, 84(3), 955-969, doi: [10.1111/cdev.12001](https://doi.org/10.1111/cdev.12001).
- Lapinski, M. K., & Rimal, R. N. (2005). An explication of social norms. *Communication Theory*, 15(2), 127-147, doi: [10.1111/j.1468-2885.2005.tb00329.x](https://doi.org/10.1111/j.1468-2885.2005.tb00329.x).
- Leslie, A. M., Knobe, J., & Cohen, A. (2006). Acting intentionally and the side-effect effect: Theory of mind and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5), 421-427, doi: [10.1111/j.1467-9280.2006.01722.x](https://doi.org/10.1111/j.1467-9280.2006.01722.x).
- Lindström, B., Jangard, S., Selbing, I., & Olsson, A. (2018). The role of a "common is moral" heuristic in the stability and change of moral norm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7(2), 228-242, doi: [10.1037/xge0000365](https://doi.org/10.1037/xge0000365).

- Mammen, M., Köymen, B., & Tomasello, M. (2018). The reasons young children give to peers when explaining their judgments of moral and conventional rul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4(2), 254–262, doi: [10.1037/dev0000424](https://doi.org/10.1037/dev0000424).
- Michelin, C., Pellizzoni, S., Tallandini, M. A., & Siegal, M. (2010). Evidence for the side-effect effect in young children: Influence of bilingualism and task presentation format.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7(6), 641–652, doi: [10.1080/17405620.902969989](https://doi.org/10.1080/17405620.902969989).
- Nichols, S. (2002). Norms with feeling: Towards a psychological account of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84(2), 221–236, doi: [10.1016/S0010-0277\(02\)00048-3](https://doi.org/10.1016/S0010-0277(02)00048-3).
- Nichols, S., & Mallon, R. (2006). Moral dilemmas and moral rules. *Cognition*, 100(3), 530–542, doi: [10.1016/j.cognition.2005.07.005](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05.07.005).
- Nichols, S., & Ulatowski, J. (2007). Intuition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 Knobe effect revisited. *Mind and Language*, 22(4), 346–365, doi: [10.1111/j.1468-0017.2007.00312.x](https://doi.org/10.1111/j.1468-0017.2007.00312.x).
- Pellizzoni, S., Siegal, M., & Surian, L. (2009). Foreknowledge, caring, and the side-effect effect in young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5(1), 289–295, doi: [10.1037/a0014165](https://doi.org/10.1037/a0014165).
- Pizarro, D. A., & Bloom, P. (2003).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moral intuitions: A comment on Haidt (2001).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1), 193–196, doi: [10.1037/0033-295X.110.1.193](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10.1.193).
- Rakoczy, H., Behne, T., Clüver, A., Dallmann, S., Weidner, S., & Waldmann, M. R. (2015). The side-effect effect in children is robust and not specific to the moral status of action effects. *PLoS One*, 10(7), e0132933, doi: [10.1371/journal.pone.0132933](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32933).
- Susskind, J. E., & Hodges, C. (2007). Decoupling children's gender-based in-group positivity from out-group negativity. *Sex Roles*, 56(11–12), 707–716.
- Uttich, K., & Lombrozo, T. (2010). Norms inform mental state ascriptions: A rational explanation for the side-effect effect. *Cognition*, 116(1), 87–100, doi: [10.1016/j.cognition.2010.04.003](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10.04.003).
- Xiao, S. X., Cook, R. E., Martin, C. L., Nielson, M. G., & Field, R. D. (2019). Will they listen to me? An examination of in-group gender bias in children's communication beliefs. *Sex Roles*, 80, 172–185, doi: [10.1007/s11199-018-0924-6](https://doi.org/10.1007/s11199-018-0924-6).
- Yucel, M., Hepach, R., & Vaish, A. (2020). Young children and adults show differential arousal to moral and conventional transgressio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548, doi: [10.3389/fpsyg.2020.00548](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00548).

## Children's Intention Judgment Under Different Norms: The Side-Effect Effect

LIU Xiping<sup>1,2,3</sup>, YUN Yifei<sup>2</sup>, CHAI Kaixuan<sup>2</sup>, LI Nan<sup>4</sup>, TANG Weihai<sup>1,2,3</sup>

(1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2 Faculty of Psychology,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3 Tianjin Social Science Laboratory of Students' Ment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Tianjin 300387; 4 Guang Dong Peizheng College, Guangzhou 510830)

###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whether preschoolers could use a rational strategy to infer the mental state of the protagonist under different norms. Preschoolers accepted a “reward and punishment task” after judging the behavior intention of the protagonist. Their judgment of “with or without” intention and the number of stars assigned to the protagonist were the indicators of side-effect effect. Results showed that: 1) preschoolers performed equally well in the judgment of “with or without” intention for the behaviors that brought about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de effects”; 2) they tended to reward the actor who brought about positive “side effects” more stars than those who brought about negative “side effects”; 3) the influence of “side effects” valence on distributive behavior was consistent among four-, five-, and six-year-old children; 4) the influence of side-effect valence on distributive behavior of four-, five-, and six-year-old children was also consistent under both moral and conventional norm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number of assigning stars is a more sensitive indicator to study the intention judgment of young children. 2) Young children judge the behaviors that violated the norms as intentional while judging the behaviors that conformed to the norms as unintentional. Moreover, this kind of asymmetrical inference is stable among four- to six-year-olds. In addition, there is no difference of such performance across different norms. 3) The results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rational accounts view of side-effect effect for the intentional judgment.

**Key words** side-effect effect, intentional judgment, norms, rationality accounts.